

“海棠杯”全国散文大赛获奖作品选登

周恩来纪念馆的荷花

江如善

(一)

七月的古城淮安，热浪袭人。我怀着朝圣的心情瞻仰周恩来纪念馆，又一次在荷塘边停下了下来。

荷花正在盛开，粉色的荷花像一张笑脸，风送荷花香，高雅，纯洁，清凉。

我久久地伫立着，想着那个人，那些事，那些他生命中最后时光。

(二)

他是无情的人吗？

1951年3月，邓颖超到杭州养病。南方春早，日暖风煦，美景良辰，她很希望他和自己共享，就写了一封信。

收到妻子来信，他一改往日的严肃，回了一封信。信就刻在故居的碑廊里：“超：西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得该打。”

当我读到时，心不由得一颤。

接到信，邓颖超迅速回复：“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悦。回报虽迟，知罪免打。”这回他可是第二天就赶忙回信了。信的最后写道：“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从1925年广州结婚起，20多年风风雨雨，相濡以沫，相知相惜，理解、尊重、默契、深情、温馨！然而，即便这样，两人中间也还有许多话，许多埋藏在心里的话没有说。

又是20多年过去，当生死离别像大山一样横亘在他们中间，该有多少话要说啊！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可是，直到永诀，这些“心里话”还是没有说。永远地埋藏在各自的心底了。

他们有过后悔吗？

1988年春天，中南海西花厅院里的海棠花又开了。再不见最爱海棠花的那个人了，他已经离开了12年。84岁的邓颖超深情回忆：

“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开放的时候，常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在花下树前，大家一边赏花一边缅怀你，想念你，仿佛你仍在我们中间。你离开了这个院落，离开我们，你不会再回来。你到哪里去了啊？”

纵有千言万语，纵想说尽心里话，可是听的人已经走了，他永远听不到了。

(三)

是什么话不能不说呢？

1976年元旦前后，他已到了弥留之际，一日三厥，气若游丝。邓颖超每日必到病房陪坐。而此时的国家也是风雨苍黄，“四人帮”骤然加快了危国乱党的步伐。从黄埔时期起便和他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了党史上许多是非曲直的叶剑英元帅，一天拿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逝世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

但直到去世，值班人员都没能记下一个字，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还是先听听他说了什么吧！

1975年6月，饱受病痛折磨的他只有61斤。第三次大手术后，7月23日，他最后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嘱咐工作人员对新同志要搞好“传帮带”。

8月24日，北海公园。他长时间望着湖水，问身边人员：“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

9月，病情急转直下，不得不取消他的外事接待活动。但9月7日，他坚持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外事活动。他坦然道：“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转而极力称赞邓小平：“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

9月20日，第四次大手术，在手术室门口，躺在推车上的他，握住邓小平的手：“你这一年干得好，比我强得多！”

12月底，病危中的他长时间没有理发。过去一直为他理发的朱殿华几次托人请求给他理发。他告诉工作人员：朱师傅给我理发20多年，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谢谢他了！

他交代医务人员：现在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医学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他一再叮嘱邓颖超：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他们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丧仪要从简，一定不要搞特殊化。

1976年1月7日，深夜11时，弥留之际，他对吴阶平，用微弱的声音给这个世界留下最后的话：“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在生命的最后，他依然想的是如何严于律己，遵守组织决定，如何为人民，为后代造福，他心里只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

(四)

做一株荷吧！

假如有一天，命运将你放逐在黑暗里，这黑暗也许永无尽头，看不到晴朗的阳光温柔的月光闪烁的星光甚至萤火虫朦胧的亮光，一丝光也没有，你会不会从此悲观沉沦？

假如有一天，命运把你遗弃在无尽的寂寞里，听不见音乐的旋律鸟儿的歌声鸟儿的低吟甚至小草拔节时的颤栗，什么声音也没有，你会不会孤独到绝望？

假如有一天，命运把你变成第二个伐桂的吴刚囚禁在淤泥里，每时每刻每分每秒，让你一遍一遍地用水清洗身体仿佛洗刷耻辱和污垢，无有穷期，你会不会心生怨恨？

假如有一天，命运夺去了你的一切：财产地位名声，健康尊严和灵魂，你一无所有，甚至死了连骨灰都不留下，你会不会感到难过和不甘？

假如能坦然面对这一切，不动摇不叹气，那么你就成了一株荷，一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

荷，一生都在修炼，修出高洁完美，炼出淡泊从容，修炼出无私忘我甘于奉献的本色。无言的荷花啊，不就像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吗？！



周恩来画像

乙未夏月 陈毅画于北京

历史，往往会在不经中转弯。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就是中国近代史转弯的大事件。这出由张学良将军与杨虎城将军共同主演的历史大剧，在1936年年末，突然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方向，结束了国共对峙，国共两党再次结成统一战线，张杨两将军也因此而彪炳千秋，然而“西安事变”这出大剧里还有另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周恩来。也许是因为周恩来的丰功伟绩太多了，以至于他在西安事变中的重要作用常常被忽略。

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有多重要，可以用张学良的话来回答。晚年，张学良谈到此事曾说：“……周至此（指周去西安后）俨为西安之谋主矣”。“谋主”一词，尽显周运筹帷幄之气度，力挽狂澜之态势。

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主要是由他来西安后的几次重要会谈串联而成的。1936年12月12日，张杨两人因为与蒋介石就国内外政治、尤其是对日抗战产生了不可磨合的分歧，毅然发动“兵谏”，武力活捉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随后张学良通电全国，提

出了“改组政府、停止内战”等八项主张，并同时给中共发出电文，要求中共派出代表来西安共商国事。

经过协商，中共方面随后便派出了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等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去西安斡旋。1936年12月15日傍晚，周恩来一行人来到了西安，随即代表团便被安排在张学良所在的张公馆居住，当天晚上，张学良便迫不及待地会见了周恩来。

此时的张学良太需要周恩来的帮助了。原因有二，一是他之前与周恩来有过几次私下会晤，对周恩来极其钦佩；二是现在的他也受到了来自各方压力，也需要周的相助。张杨二人，可能想当然地认为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而共产党与苏联关系亲密，捉蒋之后至少会得到苏联的认可。然而事实上就在事变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张学良，甚至怀疑这是张杨与日本人勾结的阴谋。而国内的军政要员则对张杨二人加大加贬，南京政府甚至于组织了“讨逆军”，国民政府的空军已经准备开始轰炸西安了。更让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包括名流学者在内社会各界人士也是一边倒的责备张杨，局势明显对张杨二人不利。

就是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到了西安。15日晚，两人见面，简单寒暄之后，张学良直入主题，把当前面临的形势告诉了周恩来，并探询中共的意见。在周恩来动身来西安之前，中共方面已经定下了“和平解决，逼蒋抗日”的基调了。周恩来说：“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团结抗日，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二是蒋介石拒绝谈判，那就宣布他的罪状，公审他给予处置。但这样将引起大规模的

内战，给日寇亡华以可乘之机……要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中共方面从国家大局出发，明确表示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件，这让张学良颇为感动，经过一晚上的深谈，两人基本达成共识。随后，12月17日，周恩来又与事件的另一主角杨虎城将军在他府邸止园进行了会谈，同样苦口婆心地与杨虎城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杀蒋只会有利于亲日派。杨虎城将军最终也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见，愿意和平解决事件争端。此时的西安，在周恩来的斡旋下，事实上已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局面，即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已

俨然结盟。这个三位一体的局面成为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质保证。

共产党与张杨二人虽然已达成共识，但这才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面对的是对此事件持敌对态度的国民政府。西安事变如同在南京政府扔了一枚炸弹，南京政府已乱成一团，也分化成了两派，即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与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美派，两派或出于公或出于私，角力于朝堂之上。何应钦等人坚决主张武力讨伐，并组成了“讨逆军”；而宋子文兄妹则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在周恩来尚未到西安的12月13日，与宋氏兄妹和张学良都交好的澳大利亚人端纳便先行来到了西安劝说张学良放蒋。12月20日，宋子文来到了西安，张学良表明了并无犯上之意，只是希望领袖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宋子文表示愿意劝说蒋介石。

随后，张学良透露了周恩来也在西安，并希望能与宋子文面谈的消息。与周恩来会谈？这让宋子文颇为犹豫，毕竟共产党还是敌对方，他心里不清楚共产党的葫芦里装了什么药。他谨慎地派出了与他同来的郭增恺与周恩来会面，郭回来向宋子文报告了中共希望和平解决事件的态度，这才让宋子文心安不少，随即匆匆返回南京向国民政府汇报。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再次从南京来到西安，在蒋介石的允许下，西安事变的几方人士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代表的共产党与宋氏兄妹代表的长期剿共的国民政府坐到了谈判桌前，政治解决西安事变的大幕终于开启了。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1927年国共决裂后，双方艰难地坐到谈判桌前了。会谈中，周恩来首先表示西安事件共产党并未参与，随后谈到了当前局势，周恩来力陈“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希望蒋介石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枪口一致对外。宋氏兄妹则坚持“应该在政府的领导下，共同努力。”由此可见，双方的观点已在接近。

12月24日，周恩来又单独与宋美龄会谈。这时的宋美龄说：“我等皆为黄帝裔，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都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动用武力。”她已明确表示愿意停止内战，以政治手段解决国内问题，双方在方向上已达成基本一致。

从12月15日，周恩来来到西安开始，便马不停蹄地会见张学良、杨虎城、端纳、宋子文、宋美龄，还要安抚东北军与西北军内的少壮派。然而，所有的这些都只是为即将到来的高潮大戏做准备，真正的高潮是12月24日晚间，周恩来与蒋介石在高桂滋公馆的会面。

周恩来与蒋介石可以说是老相识了，同时也是老同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很多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政府并参加国民党的党务活动，毛泽东曾任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而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校长则是蒋介石，可以说他们是共事多年。假若不是党派之争的话，两人或许会成为一对好搭档或是好朋友。但自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后，国共两党正式决裂，周恩来与蒋介石也自此决裂，至今已有10年未见面了。想不到，在10来年后，他们会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场合见面。

见到蒋介石，周恩来颇为动情地说：“蒋校长，我们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了。”蒋介石叹了一口气，说：“恩来呵，你既然承认是我的部下，你应当服从我的领导。”周恩来说：“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服从蒋先生的领导，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周恩来的回答很是巧妙，即顾全了蒋介石的面子，又坚持了共产党的立场。蒋介石苦笑，周恩来一直是他最器重的人才，只是可惜这么优秀的人才却一直未能为他所用。随后，周恩来重申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愿服从蒋介石领导联合抗日。周恩来口才甚佳，言辞又有理有节，再加上蒋介石也落在他人手中，最终蒋介石做了“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积极表态。至此，西安事变已达到了共产党方面既定目标，这出大剧终于可以落幕了。

纵观整个事件的和平解决，周恩来在其间合纵连横居功至伟。也许在周恩来一生中，丰功伟绩太多了，西安事变不过是他人人生中的一朵浪花。可这朵浪花最终促成了国共再次携手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也一雪百年之耻第一次以战胜者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井冈山岁月思恩来

杜子泽



的，仔细分析当时的地下革命斗争复杂环境，没有周恩来的策划指挥，贺龙、叶挺、朱德等发动的“南昌起义”也许就难能发生或推迟发生。胡绳在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书中76页)写道，周恩来后来说：“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的方向上是对的，这次起义像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败后又在这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便是在这次起义中诞生的。”

“再看《天下第一山》”这本书，人民军队缔造者有周恩来的历史贡献，有史料客观公正性定论。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也是同意攻打长沙的。起义军在攻打醴陵、浏阳、铜鼓这些县败仗后，毛泽东才当机立断，放弃打长沙的计划，毅然把队伍带上井冈山，朱德、陈毅几经周折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队伍赶到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

在军队建设方面，毛泽东也不是“先知先觉”。通过对打茶陵的失败、打遂川的成功、龙源口大捷以及边界的“三月失败”、“八月失败”的反反复复的总结，他才充分认识红四军没有根据地不行，放弃党的领导不行，丢掉政治工作不行，不做群众工作不行。当然，红四军的官兵对毛泽东的认识同样有个过程，正如萧克老将军说的那样：“红四军是由来自多方面的队伍组建的，为了革命的目标而团结奋斗，这已经是件了不起的事，至于在建军过程中，有些分歧意见是正常的。”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对其他领导人的了解，对当时客观情况的认识，允许有个过程，后人用当今完整系统的毛泽东思想衡量井冈山岁月的历史，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七大”之后，毛泽东的前委书

记落选，同样应做客观分析，毛泽东的复职，周恩来的贡献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1929年9月下旬，在上杭县召开的红四军的“三八”会议时，在林彪、罗荣桓、蔡协民、伍中豪等纵队领导的提议下，朱德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邀请信”，要求他回到前委来主持工作。当时毛泽东还有一肚子“孩子气”，立即回信说：“不打败陈毅主义，我绝不回来。”正当朱德、陈毅处于进退两难的时候，接到了中央来信，要红四军前委派一位负责人前去上海参加军事会议。陈毅是前委书记，当然是点名出席的。他装扮为洋商人，出井冈山，经厦门抵香港转至上海参加会议。

就在8月29日，陈毅抵上海，马上向上海当时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周恩来、项英等同志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时，那时党中央的总书记是向忠发，因他来自工人阶级，文化水平较低，领导工作能力较差，所以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遵照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之间多次谈话精神，决定由陈毅代表党中央起草了一封信，这就是史称中央的“九月来信”。信由政治局反复讨论，周恩来又逐字逐句审定后，在陈毅10月1日离开上海前夜，周恩来又再三反复嘱咐陈毅说：“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

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陈毅表示：“一定完成任务，请党中央放心。”后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红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是与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党中央军事前辈们分析得出的上述历史真相的逐步完成，许多细节生动又实在。它为井冈山岁月的人民军队之军旗的坚定高举，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周恩来力挽狂澜的历史功绩的认同，可谓功不可没。这是非常罕见和珍贵的唯物史观的胜利。

毛秉华在专访1927年底在井冈山担任工农革命军营长，后任空军副司令的中将谭述将军时，他已病榻床上，但大脑很清醒。在接受毛秉华专访时非常激动，即兴填了一首词《水调歌头·井冈山》：“黑夜举星火，井冈是摇篮……忆往事，思梅品，默淮安……”将军的词，意味颇深。毛泽东1960年底写了一首词《卜算子·咏梅》那词唱道：“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有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在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前的清明诗朗诵时，泪流满面，哽咽许久，才嘶声裂肺吐出一句心声：周恩来伟大的一生，难道不正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大海情怀，史无前例的，无欲无私的，伟大国兴邦的人物嘛！